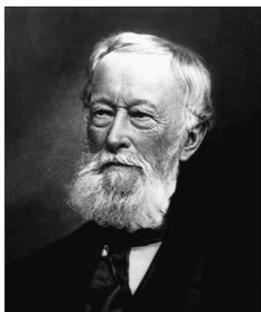


19世纪70年代后,号称“帝国兵工厂”的德国克虏伯公司走进了晚清洋务官员的视线中。淮军和湘军陆续装备克虏伯后膛炮,组建炮营;至19世纪80年代末,旅顺口有克虏伯火炮42尊,大连湾有26尊,威海卫则全部装备克虏伯火炮;北洋舰队所有主力舰也都装备了2至8尊克虏伯火炮。同时,克虏伯火炮的国产化,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晚清国防建设中的克虏伯元素

唐博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其间中国近代化军队的陆续组建,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军事采购。德国克虏伯公司成为清政府军购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克虏伯公司参与晚清军事采购活动,使晚清的中国国防建设融入了众多的克虏伯元素,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克虏伯兵工厂创始人弗雷德里希·克虏伯

从英制武器到德国装备

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的惨痛事实,令晚清朝野越发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于是,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随即兴起,其中军事改革成为最重要的部分。“坚船利炮”给洋务派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其深感“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正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购买西方船炮等军事装备,以及引进相关的制造技术,成为这场军事改革的重中之重。”

清政府最初的军购对象混乱不一,基本靠外国驻华使领馆引荐,导致湘军、淮军最初的枪炮装备制式各异、维护不便。在总税务

司、英国人赫德等人的推荐下,大批英制枪炮兵舰纷至沓来。然而,这些装备耗资巨大、技术落后、性价比低。而当时的德国是军事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其武器装备制造精良、质量过硬和受聘在华工作的德国人的忠于职守,给洋务派官员留下了良好印象。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清政府军购的主要对象,特别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的火炮,为清政府大量购用。

1811年,弗雷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创办克虏伯铸钢厂,开启了克虏伯家族企业兴起的大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营范围扩大到采矿、铸钢、军火生产等领域,其制造的铸钢火炮性能精良,在普法战争中“锋芒莫当”,行销40多个国家,为克虏伯公司赢得了“帝国兵工厂”的美誉。

德国军火输入中国始于19世纪60年代,最早的途径是德商私

运。同治九年(1870),克虏伯公司派员来华,受聘山东登莱水师,操演他们所购置的克虏伯火炮。这是克虏伯的产品和教官首次由官方途径进入中国。其后,淮军和湘军陆续装备克虏伯后膛炮,组建炮营,在收复新疆和抵抗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火炮购置的两大渠道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克虏伯产品在华销量的激增,不少洋行、公司纷纷争做克虏伯产品的中介代理。德国军火商满德最早任职泰来洋行,曾推销过克虏伯产品,与清政府官员有过接触,也曾代表英商怡和洋行做军火生意。光緒十三年(1887),满德在怡和洋行的支持下,倚仗更有利的付款条件,击败与之竞争的泰来洋行和斯米德公司,获得向李鸿章兜售16尊克虏伯火炮的资格。克虏伯公司为促成这单生



1890年冬,李鸿章(坐轮椅者)拜访克虏伯家族时的合影。

意,不惜额外给满德3厘回扣,用来贿赂清政府官员。此后,满德在德商驻华公使巴兰德等人的帮助下,获取了克虏伯高层的信任,成为克虏伯产品在华的全权代理。他所组建的信义洋行,也在19世纪80年代成为克虏伯产品在华的独家经销商。光緒十五年(1889),满德促成了克虏伯公司20年来在华的最大一笔交易——价值550万马克的火炮装备,其中43万马克定金用于贿赂中国官员。正是这批装备,构成了北洋舰队旅顺和威海卫炮台的基础。

由于清政府驻外公使们长驻各国,了解各国情况,清政府也授权驻外使节“就近查访”“采购外洋军火”。其中,驻德公使李凤苞、许景澄、洪钧3人在采购克虏伯火炮中先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凤苞赴德任公使之前,曾翻译过一些克虏伯炮学著作。赴德数载,经过多次考察,他选定伏尔铿

船厂订购“定远”“镇远”“济远”等主力舰,按照李鸿章“船坚还需炮利”的思想,配备大口径克虏伯舰炮,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中坚。任驻德公使时间最长的许景澄,较早提出海军舰炮一律使用克虏伯产品的主张,这一主张对当时的舰炮购置产生了深远影响,购炮自克虏伯逐渐成为各省督抚的共识。洋务运动后期,一些学堂和舰船所雇的德籍克虏伯厂技师,也多是出自许景澄的引荐。此外,1887年至1891年任驻德公使的洪钧,将所有销往中国的克虏伯产品的验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洋行与驻德公使相互配合,是所购克虏伯产品及时购运到位的保证。但是,洋行与驻德公使的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洪钧看来,购买克虏伯产品时,应当保证驻德公使具有订立合同的优先权,他特别厌恶满德对销售合同的控制。正因如此,光緒十五年(1889),满德为威海卫购置了16尊克虏伯火炮,洪钧就拒不验收,满德为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推动德国对华渗透和影响

关于淮军和克虏伯火炮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值得一提。光緒三年(1877)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奏请清廷准其114尊克虏伯火炮分为炮队19营,形成独立的炮营编制。光緒六年(1880)春,李鸿章对访华的克虏伯公司全权代表卡尔·曼斯豪森承诺,淮军今后将只采用克虏伯火炮。炮兵地位的的提升和火炮装备品牌的统一,当然有助于提升战斗力。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旅顺、大连、威海卫炮台和北洋舰队为例,至19世纪80年代末,旅顺口已建10座炮台,共63尊炮,其中克虏伯火炮42尊;大连湾已建6座炮台,共38尊炮,其中克虏伯火炮26尊;威海卫已建15座炮台,全部装备克虏伯火炮。显然,克虏伯火炮成为19世纪末清政府岸基防御的主战武器。北洋舰队所有主力舰也都

装备了2至8尊克虏伯火炮。克虏伯火炮的引入,对于提升中国国防实力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进口大批火炮成品的同时,洋务派官员也积极聘请德国顾问,引进造炮技术,江南制造总局、湖北枪炮厂逐渐具备了仿制克虏伯火炮的生产能力。克虏伯火炮的国产化,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克虏伯火炮的引入,也推动了德国的对华渗透和影响。大量德国教育进入中国的军事学堂,大批克虏伯炮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不少留学生前往德国学习深造,大批兵工人员前往克虏伯公司参观考察。这对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特别是晚清军事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清政府在军事改革的思路中实现了由崇尚英法到效仿德日的方向性改变。

引进克虏伯火炮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至少,克虏伯火炮大量装备海防炮台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正在改变以内陆为主的传统国防观念,海权意识正逐渐增强。

当然,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军事工业畸形发展,缺乏完整、自主的工业体系,内忧外患的国内外环境和封建制度的腐败,使得靠军事采购装备起来的海军貌似强大,却不堪一击;北洋舰队甲午战,却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显然,这些社会政治问题不是单靠军事采购就能解决的。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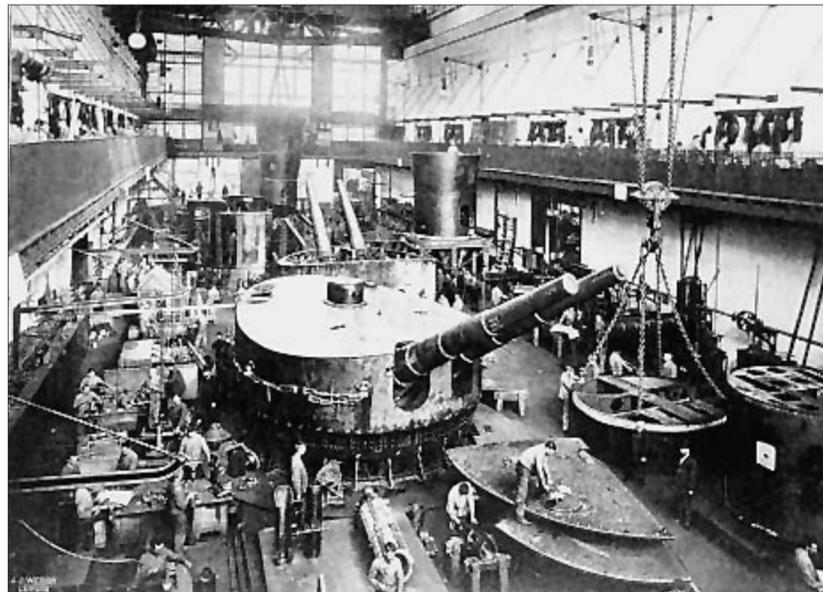
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对清代康乾盛世、北洋舰队、近代城市住房以及黄河水利史领域有一定研究。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及各种作品50多篇。

清史探秘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

一、大地数据	
制造厂家:	德国克虏伯兵工厂
制造年代:	1893年
安装炮台年代:	1896年
炮口径:	280mm
膛线:	84条
炮重:	50吨 (不包括炮架)
装弹机构(滑轨等):	
炮全长:	13965mm
炮轮轨道直径:	7360mm
方向射界:	360度

厦门胡里山炮台一门巨炮的相关资料



德国克虏伯兵工厂

文摘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在《释宫》篇里有对道路等级的分类与解释。书中的道路示意图很有趣:方块图形代表都邑或大城市,圆圈代表中小城市,箭头代表道路。从都邑通往中小城市,画一个箭头的是“一达”,称为“道路”;一达里又岔出一条,通往另一座城市的为“二达”,曰“歧旁”;以此类推,如丁字路的“三达”叫“剧旁”,像十字路的“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还有“七达”“八达”直至“九达”。

如果既没有地位又缺乏实力,那就要有意识,比如秦国。原只是周王朝养马的秦人,偏居西方一隅,却心怀称霸中国的宏图,励精图治。秦国是如何强大的?方法之一就是修路。修一条穿越秦岭、连接关中与汉中的褒斜道,再沿金牛道直抵成都,拿下巴蜀,将西部两个富饶之地牢牢掌握在手中,于是粮丰、国富、兵强、马壮。即便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也依旧不忘道路建设,将国道铺向一切势力可及的范围。有个统计数字:包括前代所修道路在内,秦时的干线道路总里程达到29670里,约合今天的12387公里。其中还有高标准的、宽约69米的驰道17920里,占总里程的一半以上。

「通衢大道」从何而来

黄秀芳

在古代,能有通达四地的交通已经很可观,于是冠之以“通衢大道”,而五六达就是“康衢大道”“康庄大道”。比喻有美好光明前途的成语“康庄大道”,大概就是这么来的。确实,有了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大路,就会人员滚滚、财源滚滚。汉代桓宽的《盐铁论·国疾》在描述西汉社会时就说“康庄驰逐,穷巷踟蹰”。但情形若相反,就会亡国。《国语·周语》里记载的一则故事很说明问题:公元前601年,周定王派大臣单襄公出使楚国,途经陈国时,单襄公看到道路破败,长满野草,难以通行,回来便和周定王说,陈国会灭亡的。果然,不出3年,楚军攻入,陈国亡。单襄公一语成谶。

但是,通衢大道与康庄大道并不是想有就有的。一是必须有地位,比如西周都邑镐京,通往各诸侯国的路就是四通八达;二是必须有实力,比如战国时期的魏都大梁(今开封)、赵都邯郸、齐都临淄,都是富裕之都,而这些国家的路况无一不是通达繁忙。史载,魏国“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大梁与陈、郑之间更是“马驰人趋,不待僦而至”,邯郸号称“四轮之国”;而临淄则道路上车马多到凸出车轮子的车轴都会相互碰撞。

(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7月)

今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成为海内外的一大盛事。时光倒流百年,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中国第一个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清末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江宁(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影响均堪称华夏“第一”,后人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一分为二地理性分析看待,首次举办如此盛大规模的商展,尚存组织经验不足、科学发明展品少、百姓因贫困而参观者少等现象。

仓促筹办 开幕延期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端方等人赴欧考察归来,二度向朝廷奏请在江宁(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清廷允准后,遂命各省筹划本域产品参展,并委派南洋新军兵督练陈琪为劝业会总办,农工部右侍郎杨士琦为审查总长,太仆张振勋为会长。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又在南京设立劝业会事务所,具体负责会筹办事宜。

南洋劝业会原定于宣统二年四月一日(1910年5月9日)开幕,展览内容包括教育、图书、科学学艺器械、经济、交通、采矿冶金、化学工业、土木及建筑业、染织工业、电气、农桑、园艺、卫生及医药等20多个行业,累计24部86门442类,约有百万展品(项目)。由于劝业会前后筹办仅有一年多时间,举办方既要向海内外积极推介会展,协调各地参展具体事务,又要组织建设二三十个会展场馆及其附属建筑设施,诸如牌楼、纪

念塔、喷水池、事务所等等,加上当时运输、通讯、施工等客观条件所限,工作量之巨大繁重、运作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临近劝业会开幕时,仍有一些建筑工程尚未完工,有的场馆虽已完工,但内部布展仍在紧张进行,具体筹办方因而不得不请示将劝业会延期举行。

四月二十八日(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正式开幕。尽管比预定时间延期了20多天,但20多个展馆也仅有教育馆、工艺馆、器械馆、武备馆、卫生馆、农产馆和直隶陈列馆按期开馆,其余的展馆以后才逐渐开馆待客。

政局动荡 影响会展展度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经济薄弱,社会落后,民不聊生。南洋劝业会虽为摇摇欲坠中晚清朝廷的“新政”产物,欲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追赶西方列强,巩固每况愈下的统治根基,但因政治肌体早已病入膏肓,仅靠举办一个盛会就想挽救其不可逆转的灭亡命运,显然是徒劳。

南洋劝业会汇集的展品大都是各地的物华天宝,真正属于科学发明创造性质的展品极少。尽管吸引了约30万海内外客商、观众前来,并且一些地方官员也借机前来观摩取经,但所提倡的重视工商发展等宗旨,却因封建观念束缚根深蒂固的“轻商”习气,并未得到较大改观。

周安庆 张宏

为主,普通百姓想要来往一趟,开销大都难以承受。举办方想出不少办法吸引人气,但百姓参会依然并不踊跃,反而使一些流氓盗贼乘虚而入,令官府不得不增派兵员确保劝业会顺利进行。由于官方筹办经费欠缺,不得不采取与民商合作办展。如开幕式当天,第1号入场券就是由旅居南洋的华侨商人梁炳农出资一万元购得,此举实乃赞助劝业会之意。另据《江苏省志·商业志》等载,该会结束时虽统计“溢支银十多万”,不过“商本亏折万巨”;门票收入达五万银元,而所征700亩土地建设会场,“地租未有进项”。因此后来南洋华商张煜南又以捐赠十万银元的善举,再表支持这一盛事。

劝业会开幕以后,原本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南京城,一度外来人流陡增,柴、米、油、盐、菜、肉等日用品需求量上涨,不少商贾乘机哄抬市价,令普通百姓难以承受。当时大街小巷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民谣:“公园赛会(指南洋劝业会),柴米贵,百姓受罪,宣统让位。”果真没多久,清廷便倾覆了。

雄姿风采今何在

南洋劝业会场占地700亩,共有全国20多个行业、省份等分别设馆参展,南洋群岛一些国家也组织参展。劝业会上的馆舍建筑汲取了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以及南洋等地风格,汇集在一起宛若“国际建筑博览会”,令人叹为观止,对民国时南京建筑风格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

动作用。场馆面积最大的是湖北馆,其中不仅展出许多当地优秀物品,甚至别出心裁地把黄鹤楼、赤壁、古隆中、放鹤亭等著名景点的复制品也搬进会场,吸引参会者。

这些馆舍原计划在以后举办博览会时继续使用,但随着晚清王朝垮台,中国陷入混战,会场馆舍命运多舛,曾经作为兵营等使

用,动乱中受损严重,仅仅过了20年,“房舍已多度圯”。1931年,人们眼中的劝业会遗址“惟屋宇颓圯难堪矣”。历经沧桑之后,如今的劝业会故址早已面目全非,建筑资料和遗物所剩无几,令人惋惜。然而百年前举办南洋劝业会的经验教训,却值得后人重视借鉴。



清末南京南洋劝业会明信片